

※ 中國翻譯史專輯（下）※

中國稗官與正史上的女性譯者

卓加真*

中國向來以「天朝」自居，視己為世界之中心，而其他外族為蠻夷之邦。因此，凡須與外族交涉之人，常為人所瞧不起。即使在朝廷中有「象胥」一職，該職位在儒家的標準來看，只能算是「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」，屬於較低階層的官職¹。

過去，翻譯學者囿於“translation”一詞的拉丁字源意思，多將翻譯視為成品，強調其從源語轉換成目的語的文字內容，而較不過問實際上將此一成品從源語轉換成目的語的主體，也就是譯者。在中國歷史上，由於女子多無受教育的機會，且囿於禮教對於她們行動的限制，女性幾乎沒有學習外語的機會與動機，也因此女性譯者不但為數甚少，相關資料亦難尋，很少受到重視。近來，翻譯研究界中開始對譯者感興趣²。韋努帝 (Lawrence Venuti) 也在《譯者的隱身》一書中指出「翻譯是對原文進行改寫」³，譯者是不可能隱形的，因為「任何改寫都反映出某種意識形態與詩學」⁴。譯文中處處可見譯者的痕跡。

中國女性譯者遊走在不同的文字與文化之間，在過去，只有男性才能擁有這種特權。我認為女性譯者是勇敢的冒險者，她們跨越邊界，遊移在不同的國度之間，觀察異地民風，她們所經歷的異文化經驗，對於長久以來習慣穩定的中國女子來

* 卓加真，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。

¹ Martha P. Y. Cheung, ed., *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(I)* (Manchester: St. Jerome Publishing, 2006), pp. 43, 36.

² See Antoine Berman, *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: John Donne*, trans. Françoise Massardier-Kenney (Kent, Ohio: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, 2009) and Maria Tymoczko, *Enlarging Translation, Empowering Translators* (Manchester: St. Jerome Publishing, 2007).

³ Lawrence Venuti, “Preface,” *The Translator’s Invisibility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5).

⁴ *Ibid.* 本文中之中文翻譯，除特別註明之外，均由本人所譯。

說，無疑是一種挑戰。本文追蹤從西漢時期到清末民初，在中國歷史上遭遺忘的女性譯者。除了從歷史文獻中找出這些女性譯者的身分資料之外，我也提供自己的評論。此外，筆者也加入小說中虛構的女性譯者角色，試圖勾勒出小說家對女性譯者的呈現。德拉巴斯與古魯曼 (Delabastita and Grutman) 曾說過，「譯者所寫的故事，以及關於譯者的故事，都蘊藏著翻譯的真理」⁵。本文中所列舉的小說人物故事，雖然都不是真人真事，但我認為從她們在小說中的呈現，多少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對於女譯者的態度。

一、早期中國史上的女性譯者義娥

義娥 (c. 200 B.C.) 是極少數在歷史上被提及的女譯者之一。據傳她是伏生 (c. 213 B.C.) 的女兒，亦有說其為伏生之孫女。義娥可算是史上最早出現的女譯者。曼素恩 (Susan Mann) 認為在動盪不安的年代中，義娥是努力保存家學的最佳典範。義娥「翻譯父親所背誦的古文《尚書》，此書在西元前二三年秦始皇焚書時遭燒毀。女兒的角色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伏生只會講古代齊國的方言，而負責謄寫文本的官員聽不懂這種方言」⁶。

然而，義娥究竟是如何翻譯父親（祖父）伏生的經典，後人不得而知。在正史的記載上，義娥的角色是完全消失的。司馬遷《史記》中〈袁盎晁錯列傳〉則是記載這名負責謄寫文本之官員晁錯 (200-154 B.C.) 的事蹟。由於當時伏生已經高齡九十，無法請他來朝廷授經，因此派晁錯前去學習。晁錯原本學的是申不害和商鞅的刑名學說，後又因為這次的機會，而能通曉儒家的《尚書》，終於受到賞識，仕途從此飛黃騰達。依著史書記載與自己的想像，明朝杜堯 (c. 1465-1509) 所留下的「伏生授經圖」（見圖一），捕捉了義娥的身影，在絲帛掛軸上提供後人對當時狀況的想像。在圖中，義娥相當於現代的口譯人員，在必要時加入自己的詮釋，應該

⁵ See D. Delabastita and R. Grutman, "Introduction: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Multilingualism and Translation," in *Linguistica Antverpiensa, New Series* (4): 11-34, quoted in Carol Maier, "The Translator as an Intervient Being," in Jeremy Munday, ed., *Translation as Intervention* (New York: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, 2007), p. 6.

⁶ 曼素恩著，楊雅婷譯：《蘭閨寶錄：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》（臺北：左岸文化出版公司，2005年），頁188。

也是難免，而漢文帝所派遣的法家學者晁錯，則負責將口傳的經書，書寫成文字。



圖一：明朝杜堇之「伏生授經圖」。掛軸，絹本，設色，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博物館 (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) 館藏。

二、馮嫪與歷史上的和親公主

女性經常擔任不同部族之間的和親角色，這在世界各地均是如此。男性利用女子柔軟身段的特色，在緊張的國家情勢中緩和氣氛。這種情況到了近代仍舊沒有改變。一九三一年日本殖民東北時，要求中國婦女上日文課，以便在殖民政府與中國同胞之間，擔任語言溝通的橋梁⁷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女性通常被迫去面對並接受語言上的差異。

蔡文姬 (177-?) 遭匈奴俘虜，下嫁匈奴王，她作詞〈胡笳十八拍〉，字句中描寫她命運多舛的一生，以及她被迫與骨肉分離的無奈，她也提及自己因語言的障礙所感受到的寂寞、孤獨：

⁷ 見劉晶輝：《民族、性別與階層：偽滿時期的「王道政治」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 58-65。

殊俗心異兮身難處，嗜欲不同誰可與語……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。⁸

在歷史上，女性為了保持部族間的和平景象，經常需要遠嫁他方，到偏遠的蠻族生活。語言差異很自然地成為這些和親公主必須克服的問題。在歷史文獻中，史家通常只讚揚這些和親公主對於國家和平的貢獻，而對於她們流浪在外所遭受的痛苦，卻很少著墨。這些和親公主扮演著文化橋梁的角色，但史家對她們的興趣，卻是她們如何為國家犧牲。

細君公主 (121-101 B.C.) 與解憂公主 (120-49 B.C.) 是歷史上知名的和親公主。根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的記載，細君公主在元封六年 (105 B.C.) 下嫁烏孫國王昆莫獵驕靡。班固難得描寫細君在異地的愁苦生活：「昆莫年老，語言不通，公主悲愁，自為作歌。」⁹ 當時，漢朝和匈奴紛紛為了拉攏烏孫，將和親公主下嫁烏孫，細君被封為「右夫人」，匈奴的公主則被封為「左夫人」。和親公主的處境更加緊張，她們必須努力討好烏孫王，以確保漢、烏之間的和平關係。為此，「細君公主至其國，自治宮室居，歲時一再與昆莫會，置酒飲食，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」¹⁰。細君公主與昆莫會面時，想必會有語言問題，史書上沒有記載是否有人擔任翻譯，但我們大可假定如果不是和親公主本人，至少會有其他女侍者為她翻譯、溝通。

解憂公主與馮嫫 (c. 86 B.C.) 則是班固提到的另一個和親公主與侍者。在《漢書·西域傳》中，馮嫫「能史書，習事，嘗持漢節為公主使，行賞賜於城郭諸國，敬信之，號曰馮夫人」¹¹。班固稱許馮嫫的外交手腕，和平化解漢、烏之間的矛盾，至於她是如何透過語言達成任務，則沒有任何記載。

三、比丘尼法澄

在西方，宗教文本是早期女性得以接觸知識的來源。雪莉·賽門 (Sherry Simon) 觀察道：「在宗教改革時期，英國女性是不准寫作的，但她們卻可翻譯《聖經》等

⁸ 蔡琰（文姬）：〈胡笳十八拍〉，網址：<http://163.20.173.1/~t88fh163/poem%20%20word/108.htm>，檢索日期：2010年5月10日。

⁹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卷66下，網址：<http://ctext.org/han-shu/xi-yu-zhuan-xia/zh>，檢索日期：2010年5月10日。

¹⁰ 同前註。

¹¹ 同前註。

宗教文本。」¹² 在十五世紀中葉的韓國，女性負責翻譯佛經，以供經典的傳播¹³。在唐朝，皇帝大力支持佛經翻譯，並組織譯場翻譯佛經。唐朝譯場規模之大，常常需要動員許多人。在中國佛教史上，常可見高僧傳記中記載他們譯經的事蹟、成就。在佛經序言中，也常常可見他們對譯經的看法，其中也記錄當時參與佛經翻譯計畫的贊助者與人員。

然而，比丘尼似乎並沒有參與當時佛經翻譯的計畫。于君方曾說，比丘尼當中有不少人是佛典的闡述者或註疏者，她們是沒有機會參與譯經工作，而不是能力不足¹⁴。在中國的歷史上，相對於卷帙浩繁的高僧傳記，只有兩部作品記錄比丘尼的生平事蹟。梁代釋寶唱(c. 495-528)所著的《比丘尼傳》成書於西元五一六年，其中大部分收錄南朝(420-528)時期六十五位比丘尼的事蹟。第二本記載比丘尼的作品，一直要等到約一千五百年後才出現，為震華(1908-1947)所編的《續比丘尼傳》，成書於一九三七年。他記錄了從梁朝一直到民國初年的比丘尼生平。由此可知，比丘尼在佛教傳統中不受重視。根據蔡安妮的統計，在寶唱的《比丘尼傳》一書中，有八成以上的比丘尼識字且受過教育。有些研習過儒家經典，有些研究玄學，也有兼通佛典與外學的。除了能夠輕鬆誦經之外，有些還能註疏經文、開座講經¹⁵。

寶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同時編撰過僧、尼二傳的人，在《名僧傳》中寶唱多記載有聲名之輩，因此可以推論《比丘尼傳》中的人物亦是如此¹⁶。她們對帝王、貴族、官吏、文人有不小的影響力，經常擔任這些人的顧問，提供各方面的意見¹⁷。在《比丘尼傳》中，寶唱雖以時間為次編排傳記，但還是可以看出他大致將傳記中

¹² Sherry Simon, *Gender in Translation: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6), p. 47.

¹³ Teresa Hyun, *Writing Women in Korea: Translation and Feminism in the Colonial Period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'i Press, 2004), p. 47.

¹⁴ 于君方著，余淑慧譯：〈比丘尼何以神聖？〉，收入李豐楙、廖肇亨編：《聖傳與詩禪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7年），頁190。

¹⁵ 見 Pao-chang Shih, *Lives of the Nuns: Biographies of Chinese Buddhist Nuns from the Fourth to Sixth Centuries: A Translation of the Pi-chiu-ni chuan*, trans. Kathryn Ann Tsai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1994), p. 7, 引用自于君方著，余淑慧譯：〈比丘尼何以神聖？〉，頁173。

¹⁶ 寶唱著，王孺童校註：《比丘尼傳校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9。

¹⁷ 于君方著，余淑慧譯：〈比丘尼何以神聖？〉，頁174。

的比丘尼分為四類，分別是在「苦行之節、禪觀之妙、立志貞固、與弘震曠遠」¹⁸這四方面表現不凡的人。在這四類當中，寶唱特別強調比丘尼背誦佛典的能力，卻低調處理比丘尼的「學者」形象。整部傳記中，寶唱只有四次提到比丘尼的文章能力，並只有一處引用比丘尼的詩文¹⁹。

民國初年震華的《續比丘尼傳》，一共記載二〇一個比丘尼的傳記。由於收錄的比丘尼中，有些是民國初年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，因此，不難想像有些比丘尼曾受過外語訓練。然而，從震華的記載我們也看到早期比丘尼譯經的可能性，其中一篇傳記選自《全唐文》中由唐朝李誌暎所寫的〈興盛寺主尼法澄塔銘〉，文中有比丘尼翻譯的紀錄。由於這是一篇墓誌銘，作者介紹這名女尼的生平事蹟，其中提到法師法澄(640-729)：

融心濟物，遍法界以馳神；廣運冥功，滿虛空而遇化。不能社理事塗，請解寺主，遂抄《華嚴疏義》三卷，及翻《盂蘭盆經》、《溫室經》等，專精博思。²⁰在這篇墓誌銘上，我們罕見地發現可能是早期比丘尼翻譯佛經的紀錄。然而，這些在當時或許流傳頗廣的經書，現在卻已失傳，目前市面上最常看到的《盂蘭盆經》是由竺法護(c. 230)所譯，而流傳較廣的《溫室經》則是由安世高(?-168)所譯。

當時，法澄與皇室關係密切，也曾在宮中擔任太子之師，後太子因謀亂罪，連累法澄，為免遭受波及，法澄隱居宮中為尼，也開始對宮中女眷傳講佛法，由於「歸投者如羽翮趨林藪，若鱗介赴江海」²¹，眾人皆稱她為女菩薩化身。後有德高望重的法師，請法澄為紹唐寺主，之後，法澄便開始翻譯佛經。

四、涉外婚婦

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香港開埠時期，西方許多商船紛紛駛至香港從事貿易活動，「買辦」一職應運而生。這些買辦經朝廷許可，能夠與外國商船交易，並販

¹⁸ 寶唱著，王孺童校註：〈序〉，《比丘尼傳校註》，頁1。

¹⁹ Wilt Idema and Beata Grant, *The Red Brush: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* (Cambridge, MA.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04), pp. 153-154.

²⁰ [唐]李誌暎：〈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〉，《全唐文》，網址：<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wiki>，檢索日期：2010年5月10日。

²¹ 同前註。

賣日常必需品給外國人。另外，還有一些人從事翻譯，作為外國人與中國朝廷之間的溝通橋梁。當時，許多買辦是由住在舢舨船上的人所擔任，他們學些船東的語言和生意上的行話，操一口洋涇濱英語。這些人是社會階層較低的船民，又稱為「蟹家人」、「艇民」或「水上人」。他們終其一生都得居住在船上，無法上岸，也不得與陸地上的居民互動或是通婚。身為社會的邊緣人物，他們與漁戶、丐戶同等級，多從事搬運工、打石匠等工作。蟹家的女子通常沒有機會受教育、學外語，因為她們多負責船上的勞動，幾乎沒有機會離開她們所居住的船隻。而且，女子也是禁止登上外國商船，或是進入外國人設立的工廠內做生意的²²。

然而，這時卻也開始出現所謂的「涉外婚婦」。經年累月在異地經商的歐洲男子難免會有寂寞孤獨的時候，而這些蟹家的女子，反而因為常常與父兄一起「搖著舢舨接送往來於輪船的旅客和貨物」²³，而與歐洲男子有了接觸。男女之間各取所需，男的排解寂寞，女的藉由男方提所供的禮物、金錢、土地脫離赤貧，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。既然這些歐洲男子與水上人家同屬受當地人排擠的外人，難免一拍即合。黎必治 (Henry Lethbridge) 在研究香港蟹家的著作中，也描述這種現象：「有些船家的女兒成為這些短暫停留在華的歐洲男子的情婦，或與他們同居。」²⁴ 當時這種華洋男女之間的關係，並沒有深厚的感情基礎，也沒有任何承諾。許多女子懷了小孩，產下了歐亞混血兒的世代，卻換不到一紙結婚證書，大多數歐洲男子會回到家鄉另娶，留下這些歐亞混血兒在中國。儘管如此，由於朝廷極度仰賴雙語人士，因此歐亞混血兒從小「均送到官方的學校，他們的表現也很傑出……女生則是進入教會學校」²⁵，他們常成為兩種文化之間具有優勢的中介者。在香港，

所有商業上和政府裏的文書工作，幾乎都由歐亞混血兒獨占，因為他們多為當地出生的居民，會說英文，比純正的中國人還要更可靠與忠誠。²⁶

涉外婚婦看到文化揉雜 (hybridity) 的好處，也了解多語能力為自己帶來的優勢。在

²² Paul A. Van Dyke, *The Canton Trade: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, 1700-1845* (Hong Kong: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, 2005), p. 56.

²³ 見鄭宏泰、黃紹倫著：《香港大老——何東》（香港：三聯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53。

²⁴ Henry Lethbridge, *Hong Kong: Stability and Change*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8), p. 175.

²⁵ E. J. Eitel, *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* (1880), p. 131, cited in Henry Lethbridge, *Hong Kong: Stability and Change*, p. 176.

²⁶ Henry Lethbridge, *Hong Kong: Stability and Change*, p. 176.

張愛玲〈連環套〉小說中，霓喜則是這樣的涉外婚婦。霓喜先後與幾個外國人和一位中國人成親，卻總是無法獲得一紙結婚證書，只能當涉外婚婦或是當人家的情婦、小妾。然而，儘管她的身分處於種種劣勢，她知道語言能力能夠為她帶來的優勢。身為小妾，在丈夫死後，她受到丈夫正室妻子的威脅，霓喜報復著對她吼叫著：「這是外國地界，須不比他們鄉下……到了巡捕房裏，我懂得外國話，我認得外國人，只有我說的，沒他們開口的份兒！」²⁷ 霓喜是社會階層較低的人物，卻因為外語能力而獲得某種力量。可惜的是，霓喜的外語能力，卻無法讓她贏得丈夫的尊重。她的最後一任丈夫湯姆生先生是個英國來的官員，但他不准她使用他的姓，而送給霓喜一個相仿的姓，霓喜可以稱自己是賽姆生太太²⁸。

五、單士釐

在一八九九年，單士釐 (1858-1945) 隨夫婿錢恂 (1853-1927) 出使日本。她不再視前往異鄉為一種羞辱，反而願意離開閨閣，參與日本的各種社會、文化活動，並努力學習日文。有時，單士釐甚至可以在不需要翻譯的協助之下，自由地與日本朋友暢談²⁹。單士釐的《癸卯旅行記》(1903) 是中國首部女性書寫的遊記，記錄她在中國、日本、韓國和滿州的旅遊。《歸潛記》(1910) 則是她的文化評論集，書中單士釐為她的中國讀者介紹西方建築、希臘神話故事，以及基督教的歷史。

單士釐不像其他外交官夫人，依賴翻譯或丈夫為她們解決語言障礙，她甚至可以在丈夫的官派譯員休假的時候，擔任丈夫的翻譯³⁰。單士釐從小喜歡閱讀旅遊札記，讀過馬可波羅遊記和一些日本人寫的遊記。在《癸卯旅行記》中，她說自己曾經嘗試翻譯福島安正 (1852-1919) 的遊記，以便練習日文，她對福島安正記載於一八九二年騎馬刺探情報的旅程印象深刻。單士釐早期閱讀遊記的經驗，讓她深信中國女子不能繼續將自己局限在閨閣之中，與外隔離而不知世事。儘管她所受的是傳統中國教育，單士釐卻認為女子應該對外面的世界感興趣，同時也應該保有中國女性傳統的美德。魏愛蓮 (Ellen Widmer) 則認為單士釐受福島安正遊記的影響很大，

²⁷ 張愛玲：《張看》（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1976年），頁74。

²⁸ 同前註，頁12。

²⁹ 單士釐：《癸卯旅行記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85年），頁713。

³⁰ 同前註。

進而也寫了自己的遊記，而福島的冒險者形象，也深植在單士釐心中³¹。

若我們採用拜爾斯 (Carmine Biase) 的定義，把翻譯視為「將訊息從一種語言重新放置 (relocation) 在另一種語言中的活動」³²，那麼，單士釐的《歸潛記》也可視為是她詮釋西方文明的翻譯作品。除此之外，單士釐亦翻譯下田歌子 (1854-1936) 關於家政學的書籍，一九〇二年由上海廣智出版社出版。當時評論家譽單士釐為中國首位女翻譯家³³。

六、賽金花與傅彩雲

女譯者很少受到小說家的青睞，若小說家願意提筆書寫她們的故事，則經常描述其負面形象。曾樸 (1872-1935) 筆下的妓女傅彩雲，便是這樣的例子。他的《孽海花》一書是以當時的人物、事件為本，講的是賽金花 (1874-1936) 和洪鈞 (1839-1893) 的故事。曾樸筆下的傅彩雲是個通外語的聰明女子。她嫁給金雯青當妾，一再懇求金讓她學外語³⁴，這是金的正室妻子絕對不願意做的事。傅彩雲知道語言能力能夠為她帶來能動性，她希望能擁有這種自由，而雯青的正室妻子是無法享受這種自由的，她「聞得外國風俗，公使夫人一樣要見客赴會，握手接吻」³⁵，這對於出身名門的中國傳統妻子來說，是極為不習慣的，因此視異域生活為一種折磨。金雯青為彩雲找了一個女師傅教她外語。不過，與其說金雯青是為了傅彩雲才找了這位女師傅，還不如說是他自己貪圖這位老師的姿色。

傅彩雲學得很快，但對於雯青來說，傅彩雲的外語能力以及她的社交手腕，根本是無法登大雅之堂。就在彩雲描述自己如何受到英女皇喜愛，並周旋於國際外交場面，雯青並不理會她的描述，而只是專注在他即將花大筆錢購買的假地圖，愚蠢地相信這地圖將為中國人民帶來福祉。傅彩雲數落雯青，他則是斥責彩雲對歷史一

³¹ Ellen Widmer, "Shan Shili's *Guimao luxing ji*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," in 《世變與維新——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1年），頁449。

³² Carmine G. Di Biase, "Introduction," in *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* (Amsterdam: Rodopi, 2006), p. 9.

³³ 顏麗珠：《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》（中壢：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，2004年），頁12。

³⁴ 曾樸：《孽海花》（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97。

³⁵ 同前註，頁90。

無所知，盡是胡鬧³⁶。

在小說中，金雯青只會死守著歷史，與彩雲的外交手腕成為強烈的對比。傅彩雲打破傳統的行為舉動，例如她穿上歐洲服飾，以及她經常不需丈夫陪同便自行外出，都是拜她的外語能力所賜，讓她不需靠著別人行事。傅彩雲在異地出盡鋒頭：

偌大一個柏林城，幾乎沒個不知道傅彩雲是中國第一個美人，都要見識見識。³⁷

傅彩雲的外語能力，讓她能夠恣意在外與僕人阿福互動，並與她的德國情人瓦德西款曲暗通。然而，在賽金花的傳記中，則是說自己在隨夫出使歐洲的時候，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舞會，而且並不像曾樸所描述的那樣洋化。事實上，賽金花在海外的時候，根本是不准穿歐式服裝的。再者，賽金花的實際語言能力，比曾樸小說中所描述的要好，若稍事準備，她可以在大眾面前以德文發表簡短演說。在小說中，曾樸並沒有對傅彩雲的語言天分有過多的著墨。在真實的世界中，賽金花沒有受過正式的語言教育，而是由一名貼身的女家教教她德文。由於這名女教師與賽金花生活在一起，因此，不難想像她的德文可以進步很快，能夠與德國國王、王后、瓦德西(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, 1832-1904)交談。據說，賽金花還曾說服瓦德西不要屠殺無辜的中國百姓。比起不會說任何外語的洪鈞，賽金花展現了會說外語的能動性。然而，在曾樸的小說中，賽金花的語言能力，卻被描述為她與其他男人調情的工具。

七、袁貞娘——《女子權》中的小說人物

清末小說家思綺齋（生卒年不詳）於一九〇七年出版一中篇小說《女子權》。這可能是女譯者成為小說角色的最初紀錄。在這篇小說中，袁貞娘是家中唯一的小孩，父母均為思想非常傳統的人物。袁的父親溺愛這個女兒，送她去城裏一所女子學校接受新式教育。袁貞娘在校課業表現良好，因此能夠繼續到北京的高等女學堂進修。雖然袁貞娘是個鼓吹女子權的角色，骨子裏卻還是個非常傳統的女性。一次她父親懷疑她和某位男子暗中來往（事實上她對該名男子的確有某種暗戀情愫），袁貞娘便以投水自殺來挽回自己的名譽。袁的父親曾一度阻止她繼續高等女學堂的教育，她竟然也順從了，實在不像當時新女性的行為。

³⁶ 同前註，頁 134。

³⁷ 同前註，頁 120。

在《女子權》中，袁貞娘是一位精通泰西語言文字和歷史的女學生。根據小說的描述，她不僅精通英語，還精通各國語言。不過小說中對於她是如何精通多國語言，並沒有任何交代。她論述女子權利的處女作，內容多為當時的陳腔濫調，經刊登於報上，卻誇張地被描述為因此「名滿天下……凡是各處學堂裏的女學生，沒有一個不說貞娘是中國提倡女權的女豪傑。久之，學界上便替貞娘起個美名，叫做『女界斯賓賽』」³⁸。袁貞娘受一位女刺繡教師之託，首次擔任她的隨行翻譯，陪這位女教習前去英、法、俄各國。在這趟旅程中，袁貞娘的翻譯表現頗佳，在多次拜訪中，她甚至搶了女教習的風采，而獲得在場人士的注意。例如，她們一起去拜訪萬國女工會的會員，這會員是一位俄國貴族夫人：

當下見了林教習，便把這會創辦的緣由和會中章程告訴了一番。後來見貞娘在旁傳達言語，頗能宛轉如意，於是與貞娘談了許久，倒覺得彼此甚為投機。³⁹

然而，思綺齋在這部作品中，並沒有對袁貞娘的譯者身分有太多的描寫，相對之下，思綺齋似乎更重視袁身為演說家的身分，多次誇張地描述袁在公開演講時所受到的歡迎程度：「貞娘演說已畢，臺下拍手的聲音，竟如山崩地塌一般。」⁴⁰

袁貞娘的語言能力，讓她得以進入到朝廷當官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：

又過了兩日，學堂中監督忽傳貞娘上去，當面吩咐道：「現在皇上因見各國的公使多半是婦女，覲見皇上之後，又要覲見皇后，因此特飭派駐各國的我國欽差，每人保舉女翻譯一名，以備大內差遣。刻因各欽差所保舉的人，一時不及來華，只得就近命學部大臣於現在女學生中，先行奏保四人，按日入職，俟來春再行更代。因此學部大臣就把你保奏上去，並奏授七品女翻譯職銜。你就從今日出了學堂，回家靜候學部大臣帶領召見之後，到內廷供職去罷。」⁴¹

從清朝的官職等級來看，七品女翻譯的官職，約與翰林院編修、國子監博士職位相當。然而，袁貞娘的翻譯工作，卻在朝廷中發生很大的影響力。皇后先是將宮中翻譯的工作內容說了一遍：「我用著你們的地方，不但要你們預備替我傳話，還要逐

³⁸ 思綺齋：《女子權》，收入《中國近代小說大系》（南昌：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，1907年），頁23。

³⁹ 同前註，頁48。

⁴⁰ 同前註，頁50。

⁴¹ 同前註，頁68。

日替我翻譯外洋報紙，以便周知各國的時事。」在得知袁貞娘曾經出過洋，皇后便問：「你可知外洋的報紙哪種最好？」此時，袁貞娘將譯者的影響發揮到極致，她特別選了幾種以提倡女權為宗旨的華字報，攜進宮中讓皇后閱讀，「自此女權之說，不覺深入〔皇后〕腦筋」⁴²。

由此看來，思綺齋似乎在創造一個積極提倡女權的新女性形象，袁貞娘的外語能力和翻譯角色，都是為了提倡女權而服務。然而，若我們進一步閱讀小說，則會發現思綺齋表面上對袁貞娘的尊敬描寫，其實隱含著諷刺。袁貞娘在經濟上並不獨立，必須仰賴父親的財產。每次知道自己越來越不可能與暗戀之人鄧述禹結婚，袁貞娘便會「哇的一聲，竟吐出一口血來」⁴³。小說中袁努力推動女權章程，而該章程的第一條竟是「女子年十六以上，曾受普通教育及自能謀食者，准予以自由結婚權」⁴⁴。整篇小說的鋪陳方式，更讓人覺得袁貞娘積極推廣女權，都是為了能與心上人結婚。由於推廣女權有功，袁貞娘不僅能夠與鄧述禹順利結婚，還因此升官被聘為宮內顧問官，且加三品女官銜，這比之前提到的七品女翻譯職銜，要來得有價值多了。

八、秋 瑾

在二十世紀初，中國女子相信留（遊）學國外，能夠帶來轉變。藉著留（遊）學，她們得以躲開女子為奴的家庭生活，而讓自己進升成為「現代新女性」⁴⁵。這是中國歷史上，首次婦女不再害怕與國外接觸，而積極利用異國情調作為啟發、改變的來源。石井洋子認為，國外經驗對於辛亥時期與五四運動的中國婦女而言，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點⁴⁶。

秋瑾(1875-1907)對於新女性的形象，受到她自己留學日本經驗的影響。在《中

⁴² 同前註，頁 69。

⁴³ 同前註，頁 71。

⁴⁴ 同前註，頁 72。

⁴⁵ Joan Judge, "Beyond Nationalism: Gender and the Chinese Student Experience in Japan in Early 20th Century," in 羅久蓉、呂妙芬主編：《無聲之聲(II)：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(1600-1950)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3年），頁 360。

⁴⁶ 同前註，頁 361。

國女報》發刊辭上，她提到中國的女子教育：

夫今日女界之現象，固於數千年來我中國學生界之現狀，可以知矣。當學堂初作，科學盛行時代，其毅然舍高頭講章，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，詎不曰新少年。新少年，然而大道不明，真理未出，求學者類皆無宗旨、無意識，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，養成翻譯買辦之材料……然而吾又見多數學生，以東瀛為終南捷徑……嗚呼，此等現象，進步歟，退步歟，吾不敢知。要知此等魔力，必不能混入女子世界中。我女界前途，必不經此二階段。⁴⁷

秋瑾似乎對於當時男性改革人士所鼓勵的翻譯活動，感到有所保留。她認為翻譯無法取代大道、真理。秋瑾對翻譯的認識，可能與她在日本留學的經驗有關。與秋瑾具有類似背景的女留學生，在日本所受的教育多為實用的訓練，而這也反映在她們的翻譯選材上。在日本留學的女子需要付出不少的學費與生活費。對於自費的學生而言，經濟壓力更是沉重，這也說明何以許多女學生只能參加短期的課程。她們通常需要靠翻譯賺取生活費。這也是秋瑾翻譯《看護學教程》的主要原因。此外，秋瑾也靠翻譯所得的稿費，投入革命運動⁴⁸。

九、結 論

「翻譯」這項活動的歷史久遠，可說是自從有人類活動開始，便有翻譯的活動。而占了人類半數人口的女性，自然也參與不少翻譯活動。然而，在女性譯者的研究上，東、西方似乎有著相同的困境。蘇珊·史達 (Susanne Stark) 即指出，在翻譯史上，男女譯者比例懸殊，也因此缺乏有系統的女譯者資料⁴⁹。然而，正如吉力安·道 (Gillian Dow) 在其為選集《十八到二十世紀的女性作家》一書中的序言所說，對每位女性譯者的個案研究，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定義翻譯對女性的作用為何⁵⁰。

相較於西方社會鼓勵女性從事翻譯活動，早期中國的女子視翻譯為畏途，她們

⁴⁷ 引自談社英：《中國婦女運動通史》（南京：婦女共鳴社，1936年），頁7。

⁴⁸ 思綺齋：《女子權》，收入《中國近代小說大系》，頁385。

⁴⁹ 見 Susanne Stark, “3.5 Women,” in Peter France and Kenneth Haynes, eds., *The 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: Volume 4, 1790-1900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), p. 125。

⁵⁰ “Introduction,” in Gillian Dow, ed., *Translators, Interpreters, Mediators* (Oxford: Peter Lang, 2007), p. 11.

不情願地從事語言溝通的工作。對她們而言，與異邦的接觸象徵著失去貞節，儘管她們的外交手腕可能受到異邦人的贊許，這樣的才能卻在本國得不到認同。在曾樸的《孽海花》中，金雯青便提到這樣的差異：

前幾年只有個曾小侯夫人，她卻倜儻得很，一到西國居然與西人弄得來，往來聯絡得很熱鬧。她就跟著小侯，一樣覲見各國皇帝。我們中國人聽見了，自然要議論她，外國人卻很佩服的。⁵¹

由此可知，「翻譯」這種語言溝通的活動，在中國傳統的女性社群中一直無法獲得肯定。這種情況在馮嫫、和親公主、傅彩雲與涉外婚婦的例子中，都可以看到。

相對之下，在西方，女性從事翻譯以表示她們願意遵守傳統價值的規範。她們不願逾越女子本分成為作家，也不願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或從事文學創作⁵²。早期西方女性從事翻譯，主要是為了謹守女人的分際，認為女人不應成為創作者。可想而知，即使她們提筆從事翻譯，所選擇的文類也多為小說（當時視為不入流的文體）、歷史、傳記與宗教文本，這些都是當時男性社會認為女人應該翻譯的文類。

從此篇論文所呈現的中國女譯者來看，不難發現當她們同時擁有其他身分時，總是其他身分較女譯者的身分更受到注意與重視。這多少與西方早期女譯者的發展不太相同。在中國，單士釐以其旅遊雜記著稱，而她翻譯日人永江正直的《女子教育論》，則鮮少受到注意。秋瑾對於女性從事翻譯活動，有不同的期許，但她終究沒有進一步加以闡述，便投身革命運動，因此犧牲了年輕的生命。《女子權》小說中的袁貞娘，利用翻譯作為工具，影響宮內皇上、皇后的女權思想，終於達到其目的而成功推廣女權，甚至因此得以升官。由此可見，在中國女性開始從事翻譯活動時，多將翻譯視為工具，而其所成就的事蹟，才是她們所重視的。

儘管如此，中國近代的女譯者與西方十八世紀之後的女譯者，卻有著相似的特點。她們都「不願再局限於自己的國家界線之內」，而是充滿了「智性上的好奇心」⁵³，以其女性的身分，詮釋著她們心目中所謂的「世界主義」。清末民初之際，中國的女性譯者數量開始增加，礙於篇幅的緣故，筆者無法一一列舉。這些人對當時的文化交流與開啟民智，有很大的貢獻。

⁵¹ 曾樸：《孽海花》，頁 105。

⁵² Susanne Stark, "3.5 Women," p. 126.

⁵³ "Introduction," in Gillian Dow, ed., *Translators, Interpreters, Mediators*, p. 20.